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complex, abstract design. It consists of numerous thin, light-colored lines radiating from various points,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movement. Interspersed among these lines are several geometric shapes, including circles of varying sizes and small crosses or asterisks. The overall effect is a textured, almost crystalline or network-like pattern that frames the central text.

世界近代史

(三)

编者董原

目 录

第十二章 日本明治维新	1
第一节 幕府统治的危机	1
第二节 明治维新	11
第十三章 亚洲人民的反封建反殖民主义斗争	18
第一节 伊朗巴布教徒起义	18
第二节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大起义	21
第三节 爪哇人民的起义	25
第十四章 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	28
第一节 第一国际	28
第二节 巴黎公社	39
第十五章 第二次技术革命及其影响	50
第一节 第二次技术革命	50
第二节 生产的集中与垄断的形成	58
第十六章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64
第一节 英国	64
第二节 法国	73
第三节 德国	80
第四节 美国	88
第五节 俄国	98
第六节 日本	113
第十七章 第二国际	122
第一节 第二国际的成立	122
第二节 第二国际的活动	126

第十二章 日本明治维新

第一节 幕府统治的危机

幕藩体制与封建等级制度 1603年德川家康在全国确立了统治地位后，日本历史进入了德川幕府统治时代。

在德川时代，日本最高统治者是幕府将军，幕府是国家的中央政权机关。幕府为了统辖其领地和直属城市，建立了一整套由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日本天皇只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实际上毫无政治权力，并受到幕府的监控。

幕府之下是“藩”，藩主亦称“大名”，全国共有藩国200多个，职位世袭。大名必须效忠幕府将军，执行将军命令。战时向将军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藩主在藩内掌握行政、军事、司法、税收方面大权。根据与幕府关系的亲疏，大名又分为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外样大名。亲藩大名是德川将军的同族；谱代大名是在1600年关原之战之前臣服德川家的大名或旧臣；外样大名是关原之战后臣服的大名，往往被置于边陲之地。亲藩大名在将军无嗣情况下可以入继。谱代大名享有参与幕政权利，大名则不得过问幕政。

为了控制大名，幕府实行“交替参觐制”，把大名分为两部分，要求他们轮流到江户朝见将军，大名的妻子

则长年留住江户作为人质，使之不能起反叛之心。在军事上幕府握有直属常备军，其兵力大约在 10 万人左右。以此保证幕府对各藩的控制。

将军、大名门下拥有大批家臣，称为武士。他们是世袭的职业军人，在德川时代，全国共有武士 40 万，高级门第出身的武士可以参加幕政和藩政，武士拥有冠姓和佩刀特权，杀死百姓可不受惩罚。高级武士拥有领地，下级武士从其主人处领取俸禄。这样就形成了以武士为基础、以将军为最高首领的幕藩领主的统治体制。

为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幕府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将全国居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就是武士阶层，属于统治阶级。农、工、商属于被统治阶级，占全国人口的 90%，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担负着沉重的赋税。在等级制度下，人们从事的职业是固定的，世代相袭。在四个等级之外，还有“秽多”（从事制革、屠宰等职业）、“非人”（艺人、乞丐），他们被视为“贱民”，是社会的最低层，受到种种歧视和迫害。

幕藩体制是以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土地全部属于封建领主所有。幕府领地约占全国的 1/4，其余的分给各大名。幕府和大名对直属领地实行再分配，幕府将部分领地分给直属将军的“旗本”，大名也将部分领地分给自己的“陪臣”，“旗本”和“陪臣”则必须向将军和大名效忠。这种等级土地所有制保证了幕藩在政治上实行的等级统治。农民拥有世袭耕作权。取得领地的大名、旗本、陪臣有权收取封建地租年贡。地租以实物为主，部分缴纳现金。农民除了缴纳地租外，还为领主负担各种劳役，为了保证地税收缴和对农民的统一，各藩实行“五家连坐”制，每五户编为一组，如有一户

滞缴租税或犯罪，其余四家负连带责任。在封建领主统治下，农民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终生被束缚在土地上。为了巩固封建经济，政府还多次下令，禁止自由种植，以防止由于经济作物的栽培导致米产量下降，影响领主的年贡收入。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商品经济发展对自给自足封建经济的冲击。

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随着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18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因素慢慢地滋生和发展起来。

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城市的发展。以江户为例，18世纪中期，江户已发展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而17世纪中期江户的人口为15万人左右，全国万人以上的中小城市达50多个。

城市的商品经济又影响了农业经济，从18世纪初以后，农村的自然经济逐渐地向商品经济过渡。随着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耕作面积的扩大，有的农民除上缴的农产品外，还出现了剩余，于是将剩余产品作为商品出卖。经济作物——桑、棉、菜籽、烟草、甘蔗等开始种植生产，逐渐出现了商品性农业区。如摄津、河内主要生产棉花；上野、常陆等地以养蚕为主；越后、伊势等地成为油菜籽的生产区。自给自足的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

在商业性农业发达地区，农村手工业发展起来，商业资本日益深入农村，手工工场也出现了。当时在日本农村盛行前贷制度。即农村商人以“换棉”、“出机”等方式控制农村家庭手工业，换棉商人以原棉供给农民，使之在家纺成纱或织成布，商人按成品数量付给工资。出机商人把织机借给农民，让其在家中加工，按成品多少付给工资。实际上这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分散的手

工工场。有一些批发商人、富裕的手工业者设立棉纺织工场，招募农家妇女为“机织下女”从事生产，建立以分工为基础的集中的手工工场。明治维新前，在丝织、陶器、酿酒、造纸、采矿、冶金等部门，都先后出现了集中的工场手工业。幕府和各藩为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也陆续兴办了官办的手工工场。据统计，1854年，全国雇佣10人以上的手工工场约300所，1867年已达400多所。手工工场的增加，更促进了商品经济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地区经济的专业分工，这就加速了商品交换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但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规模不大，在生产中还不占统治地位。

同欧洲国家相比，日本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发展水平较低，规模较小。原因在于幕府对手工工场一直采取压制政策。为了维护日益瓦解的封建经济，19世纪40年代后，幕府对手工工场的禁令不断。如1842—1843年，幕府多次发布命令，禁止工场主雇佣工人，限制织机数量，勒令进城作工的农民返回农村等等。因此，封建幕藩统治制度已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 自19世纪初，美、英、俄等国便谋求打开日本的大门，和日本建立通商关系，都遭到幕府的拒绝。1842年，幕府慑于中英战争的后果，不得不向资本主义国家妥协，曾允许外国船只在日本某些港口加煤上水。1854年，美国决定用武力强迫日本开国，派海军准将柏利率领10艘军舰，冲过浦贺，在神奈川河口停泊，迫使幕府签订“日美和好条约”，对美国开放下田和函馆两个港口，日本须供给美国船员食物煤炭，美国可在日本派驻领事，并获得最惠国待遇，从此美国

打开了日本大门。不久，英、俄、荷等国援美国先例，和日本政府也签订了类似的条约。1858年6月，美国再次强迫日本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日本被迫开神奈川（后改为横滨）、长崎、岳库、新泻、函馆五港通商，承认了领事裁判权，降低了关税，规定出口税为5%，美货入口除酒类抽35%外，其余绝大多数只抽5%。7月至9月，俄、荷、英、法等国先后又与日本缔结基本上与日美条约内容相同的条约。

日本开港以后，便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给地。自1860年到1867年，输入增加了13倍，输出增加了2.5倍。由于外国工业品充斥市场，手工工场和手工业者受到严重排挤，破产和失业者比比皆是。西方商人利用日本黄金价格较低的机会，用白银套购黄金，攫取暴利，结果日本黄金大量外流，引起物价暴涨，农民和城市贫民由于生活困苦，起义更加频繁。1859—1867年共发生了96次农民起义，全国各地也爆发了空前的市民暴动。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乘日本人民起义所造成的危机，愈加对日本进行侵略。1862年，英、法两国以保护侨民为借口，驻兵横滨。1864年，英、法、美、荷4国组成联合舰队占领下关炮台，向幕府勒索300万美元的赔偿。1866年，这4国又强迫幕府修改税率，将主要商品的进口税一律降为值百抽五。西方国家的侵略加剧，使日本民族陷于空前的危机之中。

幕府统治的危机 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自然经济解体，日本封建制度出现了危机。

18—19世纪上半期，大商人和大高利贷者崛起，他们是日本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德川幕府时期出现的受幕

府保护和扶植的特权商人，从幕府和大名手里花钱购买了某些商品的专卖权，从而取得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获取丰厚利润，成为大富商。其中大阪的“二十四组问屋”（二十四家批发行）和江户的“十组问屋”最为有名。“十组问屋”每年仅向幕府交纳税金达万两以上。在京都、大阪等地还有称为“两替庄”（钱庄）的大高利贷组织，在大阪拥有20万两以上的“两替庄”就有50多家。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名、武士的生活也日益腐化奢侈，使其收入远不够挥霍，因此，不得不向大商人和大高利贷者借债。元禄年间（1688—1703年）就有20多家大名向鸿池屋两替商借款。19世纪中期，大阪商人贷给大名的款额达6000万两黄金，其利息相当300万石大米。大商人、大高利贷经济势力迫使一些诸侯大名拜倒在他们脚下。而大商人们往往又通过经济力量来控制 and 影响藩政，以至形成“藩政疲弊，权落商人”的局面，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幕府有时采取打击政策。1789年幕府颁布“捐弃令”，宣布废除1784年以前商人对“旗本”、“御家人”的债权。1843年再次发布“捐弃令”，从而引起大商人大高利贷者不满，在后来的倒幕运动中，一部分大商人站在倒幕派一边。

德川幕府后期，日本各级武士约有40万人，连同家属有180多万。武士本来是依赖于封建制度的，由于幕藩逐渐减少禄米供给，武士的生活日趋贫困。中下级武士对上级武士产生了不满情绪——“恨主如仇”。

为了维持生活，一些下级武士不得不从事其他职业，如医生、教师等，有的从事工商业活动，还有的上升为批发行资本家。这些人在经济利益上同资产阶级日趋一致，成为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在反对封建幕府的

斗争中成为资产阶级的同盟。也有一部分下级武士过继给豪农、富商当养子，或同富商女儿通婚，转化为工商业者，从而直接同资产阶级结合起来。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维护封建秩序的儒学受到新的思想流派——兰学的挑战。在德川幕府时代，“程朱理学”被推为官方哲学。程朱理学极力宣扬“上者贵，下者贱”、“上下不违，贵贱不乱”的封建伦理，从思想上对人民进行统治和奴役。1720年，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放宽了“禁书令”后，准许西洋自然科学书籍输入，随之在日本形成“兰学”，到19世纪初，兰学在江户、大阪、京都、长崎等城市的知识界得到传播。“兰学”是指用荷兰文来研究西方科学、文化，包括天文、医学、草木学、兵学。通过学习兰学，一些资产阶级化的武士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政治思想，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民主思想，并且从新的经济地位出发，对幕府昏聩无能的统治，发出了改革的呼声。由于他们享有政治特权，在思想文化水平和组织能力方面都优于当时政治上尚未成熟的资产阶级，因此，一些有志于改革的下级武士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成为倒幕斗争的领导力量。

德川幕府统治末期，日本社会充满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广大自耕农和佃农受封建主、新兴地主和高利贷者的重重剥削。由于领主的财政收入日益减少，于是他们大肆搜刮农民，提高地租、加重捐税。再加饥荒经常发生，逼得广大农民揭竿而起。据统计，1801—1867年共发生1169次起义，比整个18世纪还要多。这些起义规模大，时间长，参加者达几万至几十万人。起义农民提出收回抵押土地，反对增加租税、杂税和赋役。他们捣毁地主庄园，打杀地主、政府官吏，把压榨农民的地

契债务等文书付之一炬。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幕府和大名的封建统治，农民是反幕藩封建统治的主力军。

市民暴动接连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1837 年大阪发生的由大盐平八郎领导的起义。大盐平八郎（1793—1837 年）出身下级武士家庭，他目睹政府腐败和人民的疾苦，决心用武力去推翻恶政。1837 年 2 月 19 日，他率 300 余人袭击富商住宅，夺取粮仓，把大米分给贫苦群众。起义发生后，政府急调军队镇压，起义终因寡不抵众而失败。大盐平八郎起义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由下级武士组织贫民进行的反封建压迫斗争。在这次起义的推动下，河内、越后等地相继发生农民起义。农民和市民的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幕藩封建统治，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灭亡。

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幕府于天保 13 年（1841）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改革。但是改革仍围绕着如何加强幕府统治而进行，因此遭到失败。一些藩在幕府改革的同时，也仿效幕府进行改革，均遭失败。而长州、萨摩、土佐、肥前等藩由于实施了一系列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措施而强盛，经济、军事实力得到加强，成为后来倒幕运动的根据地。

尊王攘夷与倒幕运动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际，一部分下级武士改革派联合朝廷中的公卿、大臣，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掀起了反对外国侵略势力及其代理人——幕府的运动。

“尊王攘夷”口号原是由水户藩藩主及其近臣提出来的。这一口号原旨在于维护幕藩体制。自 1853 年后，随着幕府采取的媚外投降政策，一些受兰学影响较大的西南各藩大名和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联合起来，他们

借用“王政复古”之名，以行改革幕藩体制之实，反对幕府的独裁和卖国，重新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进行反幕府的活动。1858年，当幕府奏请天皇批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时，以长州藩的吉田松阴和萨摩藩的西乡隆盛为首的下级武士聚集京都，联合部分公卿挟持天皇，驳回幕府奏请，主持幕政的大老井伊直弼下令，逮捕倒幕派人士百余人，处死桥本左内、吉田松阴等7人，西乡隆盛流放大岛，史称“安政大狱”。幕府的镇压只能使矛盾更加激化。1860年3月，水户、萨摩藩武士在江户樱田门外刺死井伊直弼，又于1862年2月在坂下门外击伤老中安藤信止。樱田门事件使反幕府的斗争进一步高涨，尊攘派同一部分公卿、豪农、豪商结成反幕府同盟，于1863年初以天皇名义敕令幕府攘夷。

尊攘派原指望萨藩藩主来实现“尊王攘夷”大业，但萨藩藩主进入京都后却为自己夺取“雄藩”地位而奔忙。为了维持封建秩序，他甚至诬蔑尊攘派的活动是“浪人轻率之举”而加以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尊攘派提出抛开大名实行“草莽”横向联合。

1862年，长州藩武士在江户烧毁英国公使馆。同年，萨摩藩武士在横滨附近轰击英、法商船。7月，英国炮轰萨摩藩鹿儿岛，强索巨额赔款。同年，英、法两国又以保护侨民为名，驻兵横滨。在攘夷斗争中，长州、萨摩两藩的下级武士改革派领导者高杉晋作和久坂玄瑞等人，开始认识到不应该盲目攘夷，而应该开国进取，学习西方以实现富国强兵，适应新的经济关系。为了反对幕府的投降卖国政策，必须推翻幕府的统治，“尊王攘夷”运动也就发展为倒幕运动，尊攘派变成倒幕派，这意味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转变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1863年，长州藩倒幕派首领高杉晋作执掌长州藩政，组建了一支由下级武士，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的奇兵队，积极从事倒幕运动。同年8月18日，幕府发动“八一八”政变，把倒幕派赶出京都。1864年8月，长州藩倒幕派久坂玄瑞率兵攻入京都，在皇宫的哈御门与幕府军展开激战，久坂兵败自杀。史称“禁门之变”。8月24日，在幕府策划下，天皇以追究“禁门之变”为由，下令诸藩征讨长州。9月5日，英、美、荷、法四国联合舰队进攻下关。长州藩在内外夹击下，被迫屈服，幕府不战而胜，藩政权为保守派掌握。

1864年8月，幕府联合萨摩藩的保守派，发动第一次对长州的战争。虽然幕府军胜利，但倒幕派的力量并未因此而削弱。1865年，长州倒幕派高杉晋作重新掌政，征募农民和市民入伍，再次组织奇兵队，积极筹划推翻幕府。不久，又与控制萨摩藩政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结成联盟。倒幕派的力量更加强大起来。

1866年6月，幕府发动了第二次对长州战争。但许多大名看到幕府大势已去，都按兵不动。这时幕府直辖地和兵库、大阪等重要城市的农民和市民，又举行暴动，使幕府处于背腹受敌的地位，只得退兵。1867年安艺藩和土佐藩也加入了讨幕联盟，反幕势力更加壮大。10月反幕军开始东进，迫使将军德川庆喜辞职，还政天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和岩仓具视等掌握了政权，三井、小野等商家在财政上予以支持。新政府决定彻底剥夺将军的权力，勒令他交还土地。这个决定引起将军的反抗。

1868年1月3日，倒幕派以天皇名义发布了《王政复古号令》，声称“诸事皆本神武创业之初”，一切权力

重归天皇。宣布废除幕府及一切旧的官制，建立由总裁、议定、参与组成的三职制的天皇政府。总裁由炽仁亲王担任，议定由公卿和藩主担任，参与由廷臣、藩士和平民担任。倒幕派中坚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都担任了“参与”。

新政府成立后，大久保利通提议勒令德川庆喜交出“兵马之权”和领地、领民。庆喜及其家臣拒绝，决心发动战争，同新政府决一死战。1866年1月，德川庆喜以“除君侧之奸”为名，亲率幕府军分两路从大阪出发，进军京都。西乡隆盛指挥的新政府军在京都郊外的伏见、鸟羽两地同幕府军展开激战，政府军击败幕府军，德川庆喜败逃回江户。1月31日，天皇政府下令征讨德川庆喜。2月25日，天皇下诏亲征，以炽仁亲王为东征大都督，西乡隆盛为参谋。同时命令各藩大名立即参加讨伐幕府的战争。因时为旧历戊辰年，史称“戊辰战争”。

内战开始后，幕府军节节败退。3月，西乡隆盛率领的政府军兵临江户城下。在英国公使的调停下，5月3日，德川庆喜献城投降，庆喜投降后，关东和本州北部地区的幕府残余势力仍举兵负隅顽抗，会津等藩还组成了反政府同盟。新政府乘胜进军，于1868年基本上平定了本州全岛。但幕府重臣 本武扬率领8艘军舰北上，在北海道建立了“武士共和国”。1869年5月（阴历），经五稜廓一战， 本武扬被迫投降。至此，幕府残余的反叛全部被平息，戊辰战争结束。

第二节 明治维新

明治政府的建立 1868年10月23日天皇睦仁将年

号改为“明治”。这时明治天皇（1852—1912年）还是一个15岁的少年，政府的实权为改革派武士掌握。明治政府适应地主资产阶级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史称“明治维新”。明治初期首先对国家机构进行了调整。早在1868年4月，明治天皇就颁布了“五条誓文”，做为施政纲领。6月，发布《政体书》，实行“太政官制”（官是机构名称），规定一切权力归“太政官”，太政官之下设“议政”（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太政官制”采用了日本古代王朝使用的名称，而又模拟了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实际上大权掌握在行政官之手，行政官辅佐天皇处理政务，从而完备了天皇亲政体制。“太政官制”后来又进行了若干次修改，明治四年的修改，使国家机构进一步完善；中央设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及参议总揽政务，下设内务、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司法、工部、文部等省。在国家机构的调整中公卿和藩主逐渐被排除，下级武士改革派如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人在政府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这些人成为维新的骨干，同时也形成了官僚专制的政治格局。

奉还版籍与废藩置县 为了加强中央权力，明治初期推行“奉还版籍”（版，指土地；籍，指户籍）和“废藩置县”措施。下令各藩大名交出土地和对人民的封建领有权，任命大名为藩知事，以原领地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他们的俸禄。1871年7月，明令“废藩置县”，打破藩界，将全国划分3府（东京、京都、大阪）72县，由中央任命府、县知事统辖。旧藩主迁居东京，仍由国家发俸供养。从而改变了过去由大名控制的封建割据局面，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废除封建等级制度 1869—1872年间,明治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宣布改变了原来的封建身分制,大名、公卿改称华族,一般武士改称士族,农、工、商和贱民称为平民。华族士族和平民可以通婚。废除士族佩刀制度。华族、士族仍由政府发给俸米,1876年,修改俸禄制度,制定以公债代替俸禄的条例,公债券一次发给领受者,他们之中有的用公债购买土地,成为新兴地主,有的投资工商业,成为资本家。士族每人领受500元公债后,成为小商人、自由职业者或城市贫民,少数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至此,封建武士集团宣告瓦解,取消了封建等级制,扩大了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但是,封建武士道残余,等级界限并未彻底消除,贱民地位尤为低下。

地税改革 1872年,政府下令废除自1643年颁布的关于土地不得买卖禁令,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种植。同年,对全国土地实行丈量并颁发地照,确认了耕种者的土地所有权。

1873年7月28日,明治政府公布了《地税改革条例》和《地税改革布告》,宣布废除根据土地收获量定税及缴纳实物的旧税制,实行新的地税制。主要内容是:(1)全国各地,不论水旱田,统一按土地法定价格征税,税率为3%,丰歉之年不予增减。(2)新地税皆用货币交纳,由土地所有者承担。(3)土地所有者还要附加缴纳合地价1%的“村费”。1877年1月,由于农民的斗争,地税降至地价的2.5%。1881年地税改革基本完成。土地和地税改革彻底废除了领主土地所有权,确立了新兴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权,标志着近代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地税改革以货币地租代替过去的实物地租,这就有可能使

地租转化为资本，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同时又为地主、富商兼并农民土地、产生地主阶级创造了条件。

建立近代军事和警察制度 1871年，明治政府从萨、长、土三藩军队中挑出精良士兵组成近卫军，作为天皇近卫军队。1873年又效法西方军事制度，实行征兵制，着手组织常备军，称“皇军”。日本军队虽然按西方模式建立起来，但却继承了封建武士道精神，许多旧武士充当新式军队的军官，在军中强调忠君爱国的封建思想。

为了加强对国内革命力量的镇压，日本仿效欧洲国家建立起近代警察制度。1872年司法省设立了警保寮，统一指挥全国警察。1874年，警保寮归内务省掌管。日本政府还在东京设立了警视厅，在全国建立起庞大的警察网络，警察派出所遍布全国的城市镇乡。

殖产兴业 明治维新的目标是使日本达到“富国强兵”。维新派们认为，要“富国”则必须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发展工业。所谓“殖产兴业”，就是充分发挥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动用各种政策手段和国库资金，干预国家经济建设，扶植和发展资本主义。

1870年，明治政府成立了工部省。为了考察欧美各国的财政经济制度和工业生产发展状况，1871年底，派出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组成48人的使团赴欧美各国进行访问考察，另有59名留学生随行。1873年9月先后归国，历访美、英法、德等12个国家。使节团归国后，大久保利通于1874年5月向政府提出了《殖产兴业建议书》，主张依靠政府力量，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以推进国家的强盛。

从1874年起，为了推进工业发展，明治政府采取种

种措施，如创办官营“模范工厂”引导民间兴办工业，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聘请外国技术人员等等，这些措施大大地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日本政府还十分重视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修建东京至横滨铁路，后来又鼓励私人兴建铁路。电报和电话等近代通讯事业在政府的经营下也发展起来。1877年，日本引进了电话，首先在东京——横滨间使用，以后推向全国。1885年前后，电报干线基本建成。近代通讯网络逐渐形成。

文明开化 在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19世纪70年代初明治政府在国民中推行“文明开化”政策。所谓“文明开化”就是对民众进行包括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风俗方面向西方学习的宣传和教育。在文明开化教育中，一些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起到了先锋作用，福泽谕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福泽谕吉（1834—1901年）出身于低级武士家庭，青年时代热心于兰学。1860—1867年间曾三次游历欧美诸国，深受西方思想影响。1866年写了《西洋事情》一书，广泛介绍欧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此书出版后极为畅销。《西洋事情》一书使日本人大开眼界，耳目为之一新。福泽谕吉说：我们洋学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介绍西洋实际情况，使我国国民有所变通，早日进入开化大门。明治时代，福泽谕吉继续进行文明开化的宣传教育，他后来写的《劝学篇》、《文明论之概略》成为日本进行文明开化教育的教科书。

19世纪70—80年代，学习西洋文明的风潮席卷了整个日本。孟德斯鸠、卢梭等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出版，出现了中江兆民、植木枝盛等